

書名：《宋代學記文研究：文本闡釋與文體考察》

作者：倪春軍

出版：復旦大學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2021年8月

頁數：281頁

幾乎所有人到達學齡以後，會有十到二十年的時間在學校接受教育，這種情形在目前的中國已習見為常，但施予教育的小學、中學、大學乃至研究生院這一體系，其實是晚清以來纔逐步建立的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所熟知的教學系統，基本上是從西方社會移植過來的，在其初期，有“新式學堂”之稱。在此之前，傳統中國的教育史，當然也並非乏善可陳，而且由於科舉制度的存在，國人對“考試”這件事具有相當的熟稔度，至今仍把許多科舉話語移用於高考。不過，科舉雖稱“考試”，其主體部分並不採取對答案、判分數的形式，所以它更像是一種作文競賽，有關能力的養成未必依靠學校。我們在各種反映古人生活的文藝作品中，可以看到兒童到學校接受啟蒙教育，但秀才們則大抵在家裏溫習功課，通過自學，或者向前輩請教，以提升作文能力，這個階段的他們不再需要上學。就此而言，與科舉制度相適應的學校教育，即便非常繁榮，其發展的程度卻極其有限，以純粹的知識增長為追求的人，將不能在這樣的學校獲得生存的資源，而後者乃是現代高等學校的一個關鍵特征。

那麼，怎樣看待傳統社會的學校？如果我們不是簡單地把它們看成現代學校的前身或雛形，這就成爲一個問題。古人熱心於辦學的，當然自具理想，畢竟也不能說他們的學校只爲科舉而設。所以，傳統的學校應該是一種與現代學校具有相當差異的教學空間，對此加以考察的一個重要途徑，是看古人對他們的學校如何自述。由此，我們關注到北宋時期開始蓬勃興起的一個文章類型：學記。歐陽修的《吉州學記》、王安石的《虔州學記》等，就是這方面

的名作，而終趙宋一代，此類文章蔚為大觀。在 2007 年，劉成國教授和我本人曾從各自的角度論及宋代的學記，2011 年倪春軍來復旦大學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，選了宋代學記為研究課題，五年後完成其博論，又五年，據博論修訂的《宋代學記文研究——文本闡釋與文體考察》一書正式出版（復旦大學出版社 2021 年 8 月），成為對此領域全面加以論述的第一部學術專著。應當說，春軍著此書，“堅持‘文學’和‘文體’之研究本位”，跟我自己關注學記的視角不甚一致，但此書仍更新和豐富了我對宋代學記的認識，故願向讀者推薦。

一 文體學視野下的“學記文”

如上所述，我並不認為對“學記”的研究需要堅持“文學本位”，但毫無疑問，我們首先要在文體學的視野下對此類文章加以總體把握，而文體學的考察方法，確實是在文學史研究領域成熟起來的。雖然有的學者可能更習慣把“學記”這樣的類別叫做“文類”而不是“文體”，但不管“文體”或“文類”，應該都是“文體學”的考察對象。從“文體學”入手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，因為一旦接觸到宋代的相關史料，我們就會發現，可以被歸在這一類當中的，並不只有題為“XX 學記”的文章，如果單看題目，那就既不能確定研究對象的全貌，更無法梳理其起源、成立與流變的過程。我和劉成國教授初論宋代學記時，多少都犯有這方面的偏失，春軍此書則能在緒論中，首先把此類文章的整體範圍呈現出來，繼而在第一、第二章中溯其源流、考其成立。當然，實際的研究過程應該是結合了對源流、成立的考察，來確定文類的範圍的。

對此範圍，書中有簡捷、明確的揭示，就是“以‘學校’為寫作對象，以‘記’為文體形態的記體文”（頁 2）。既如此，則傳統社會或者具體說宋代，存在哪些形態的官私學校，就是不可或缺的考察環節。春軍把他的考察結果畫成如下的圖表：

學記文	1. 孔廟記	夫子廟記、文廟記、文宣王廟記、大成殿記等
	2. 學記	州學記、府學記、軍學記、縣學記等
	3. 書院記	書院記、精舍記、書堂記等
	4. 中央官學記	太學記、國子學記、宗學記等
	5. 其他形式的私學記	義學記、家塾記等

從此表不難看出，我們熟悉的那些著名“學記”大抵屬於第2類，即各地官學的學記，這當然與北宋以來不斷升溫的“興學”政策相應，也與大部分作者的士大夫身分相關，重視和興辦地方官學，可以算是他們的政績。這類學記往往會論述學校教育與文化延續、政權建設、社會治理以及人才培養等方面的關係，實際上成爲表達作者教育思想的重要載體。“學記”作爲一種文體的成立，便是就此類文章的成熟而言。第3、4、5類可以看作該文體成立後的擴展形態，雖然標題中未必出現“學記”二字，但把它們視爲同類的文章是比較容易理解的，既然存在這些形態的官私學校，當然就會有相應的記文。其中書院記在南宋還頗具光彩，所以該書後面專設一章加以論述。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第1類孔廟記，把有關孔廟的記文納入考察的範圍，就此書的寫作而言，是一個重要之舉，因爲這直接影響到作者從哪個方向進行文體溯源，從而也決定了第一章《宋代學記文的起源：從孔廟碑到孔廟記》的設置。

按唐代的政策，各州都建立孔廟，而學校往往附屬於孔廟。廟、學一體的傳統，在中國綿延甚久。這樣的學校本身可有可無，興廢無常，但寫作記文的時侯，爲了證明建廟並非勞民傷財的無益之舉，就會誇述其附屬學校的教育功能，從而使孔廟記的寫法跟學記相近。這在北宋的某些士大夫比如王安石看來，是一件荒唐的事。他認爲孔廟乃是模仿佛寺、道觀的產物，根本不合儒家之禮，應該重視的是學校而不是孔廟。爲此，他跟許多宋代作者一樣，努力去考究古老的經典，從中發掘出一套比孔子更早的三代學校制度，並準備通過自己的政治改革，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復興之，使學校養才能夠取代科舉的取士功能。此種思想貫穿在他的學記寫作之中，凸顯了廟、學關係這一話題。可想而知，只

要廟、學一體的現象存在，這個話題必將獲得回應，而千載之下，王荆公的理性光芒終不可掩。

當然，孔廟記是不是宋代學記的“起源”，可能還是一個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。春軍在書中指出，宋人王應麟曾將唐代柳宗元的《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》稱爲《柳州學記》，韓愈的《處州孔子廟碑》也被許多宋代學記當做先驅之作提及（頁8），這說明宋人自己是把它們視爲同一類文章的。看來，作爲“起源”之一，應該是可以的。爲了跟狹義的“學記”（即上述第2類地方官學記）稍示區別，春軍將包含孔廟記和各種學校記在內的這一大類文章，統稱爲“學記文”，以便整體考察。我認爲他的這個做法很有見地，因爲前有孔廟記，後有書院記，學記一體就呈現了來龍去脈，“學記文”的歷時形態便被勾畫出來。這當然是“文體學”視野下的考察結果，但其意義並不局限於此，因爲“學記文”的歷時形態，也是傳統學校教育和有關思想的歷時形態。雖然“文體學”的考察方法是在文學研究中成熟起來的，但我認爲其他領域也應適當運用，比如我曾接觸一些研究歷代孔廟的論著，了不涉及這裏說的學記，肯定會造成欠缺。與此相反，春軍研究學記，卻能將孔廟記納入考察範圍，自然值得贊許。

二 “文章學”與文本闡釋

“學記文”是一類文章，對它的研究當然屬於“文章學”，而春軍此書本身就是其導師王水照先生主編的“復旦古代文章學研究書系”的一種，書後附錄的《中國古代文章學的概念變遷與學科構想》一文也提示出他的有關思考。我們知道，水照先生一直倡導與“詩學”“詞學”平行的“文章學”研究，春軍無疑繼承了這一思路，或者說他的學記文研究，就是在先生指導下的一次實踐。

不過，與“詩學”“詞學”平行的“文章學”研究，實際進展是相當艱難的，因爲我們對於文章，確實不如對於詩詞那樣，已有一套比較成熟、行之有效的批評方法。所以，目前幾乎僅有“文體學”考察的成果較爲充實，甚至有不少人提問：除了“文體”考察外，“文章學”研究還可以怎樣進行？自然，“文章學”當以“文體”考察爲首要內容，但並不等於“文體學”，至於具體批評方法，雖尚有待

探索,但我覺得春軍此書的副標題中,除“文體考察”外還有另一個關鍵詞“文本闡釋”,是值得重視的提示。無論怎樣的批評方法,都離不開對文本的解讀和闡釋。

春軍的文本解讀,是相當細緻的。在我看來,其精彩之處,是並不把尋繹的目光封閉在某一個文本之內。比如第一章第三節對歐陽修《襄州谷城縣夫子廟記》的解讀(頁56—72),就是很顯著的例子。這篇廟記是為谷城縣令狄栗而寫,而歐陽修另有《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》,是狄栗的墓誌。春軍發現了這兩篇文章紀事的細微差異,再聯繫史書所載宋與西夏關係的事實,加以考訂,得出廟記更可能作於寶元二年(1039)的結論,對南宋以來傳統的作於寶元元年之說加以糾正。廟記之中照例談到了學校,歐陽修跟許多北宋士大夫一樣關注廟、學關係的話題,他的獨到之處是以對“禮”的考究來處理這一話題。因此,春軍在解讀時,就把廟記文本與《禮記》鄭玄注、孔穎達疏,以及《大唐開元禮》的有關文字進行比對,揭示出歐陽修對《禮記》的尊重,對韓愈觀點的批評和對現實的明褒暗諷,由此確認其委婉曲折的行文風神。這一節解讀相當成功,可能得益於春軍本人比較完備的知識結構,但我覺得關鍵在於他重視了各種文本之間的廣泛聯繫。這就是“文章學”相對於“詩學”“詞學”的特別之處。按傳統的說法,詩詞吟詠情性,文章為事而著,故詩詞文本可以是個相對獨立的世界,文章的意義指涉卻總在文本之外。雖然在解讀某篇詩詞時,有的學者也會聯繫到別的文本,但通常情況下我們也不妨作封閉式的解讀,而對於文章,尤其是學記文的解讀,則必須是開放的,必須有更豐富的知識儲備,更廣闊的聯繫視野,如果用目前常見的詩詞鑒賞之法來處理學記文,我們將一無所得。這也是我不認為研究學記文需要堅持“文學本位”的原因。實際上,春軍的這一節解讀,主體部分是史學和經學,只有最後幾句連帶到文學。

不過,“文學本位”的闡釋立場更為集中的體現,是在此書的第二章《宋代學記文的成立:北宋文學家學記》。這一章處理的對象,基本上是狹義的學記,即北宋的地方官學學記,且多出文章名家之手,包含了學記一體最典範的作品。春軍的論述篇幅並不甚大,卻把典範學記的核心特征“深於經術”、“議論正大”概括出來,並試圖建設性地樹立“宋四家學記”的觀念。這四家,指的是

歐陽修、曾鞏、王安石和李覲，他們的學記在歷代文章選本、評點中獲得了最高評價。我們知道，選本、評點是文學批評的傳統形態，在此基礎上加以申述，對“文學本位”的闡釋立場是有利的，也可以成為“文章學”研究的有效途徑。

就個人的閱讀體會而言，“宋四家學記”之說是令我深感意外的。這是因為我對傳統的選本、評點常抱偏見，讀之時而生厭，覺得它們大抵無聊，因而未能察見其推崇的學記範本是哪一些。若據“深於經術”、“議論正大”這兩點核心特征，我以為學記的巔峰之作是王安石的《虔州學記》，而與之分庭抗禮的，是針鋒相對地提出了相反意見的蘇軾《南安軍學記》。當然，如春軍分析的那樣，《南安軍學記》在文本上有些瑕疵（頁87），但類似的瑕疵恰恰也見於《虔州學記》。文章不是詩詞，不必以通體精美、咀嚼無滓為追求，尤其唐宋古文，精神在於“載道”，在於點燃一團思想的火焰，更萬世而不滅。歷代選評者之所以對《南安軍學記》不夠重視，我認為是他們沒注意到此文是針對《虔州學記》的一篇駁論，需要先讀《虔州學記》，纔能明白蘇軾引釋經文、辨析字義、展開論述的進路，是被前者所牽引的。王安石試圖依據經典，恢復起三代學校養才的制度，由此建設政教合一、上行下效的一種社會文化，蘇軾則試圖摧毀王安石的經典依據，聲明學校的首要功能在於發表異議、引領輿論。對於學校教育的這兩種相反意見，正好使兩篇學記足以雙峰並峙。那麼，最獲選評者青睞，“成就似乎又是四家中最高的”（頁83）李覲《袁州學記》，情況又如何呢？不妨把此篇的議論部分引述於下：

惟四代之學，考諸經可見已。秦以山西鑿六國，欲帝萬世，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，武夫健將賣降恐後，何耶？《詩》《書》之道廢，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。孝武乘豐富，世祖出戎行，皆孳孳學術，俗化之厚，延於靈、獻。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，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，群雄相視，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，教道之結人心如此。今代遭聖神，爾袁得賢君，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。天下治，則禪禮樂以陶吾民，一有不幸，猶當伏大節，為臣死忠，為子死孝，使人有所法，且有所賴。是惟朝家教學之意。

對比秦、漢兩代治理效果之差異，李覲強調的是學校教育對政權的重要性，這便是選評家所謂“立論高遠”。由此可見北宋的“興學”政策確實引出了士人對學校功能的多種思考，王安石希望藉學校養士來締造統一的社會文化，蘇軾反之，主張學校的異議權力，而李覲認為學校的首要功能是教人們保持對國家的忠誠。很有意思的是，這種自覺站到國家立場的教學觀，不是出自王安石、蘇軾那樣的高級士大夫，而出自幾乎終生沉淪民間，在最後歲月纔獲得太學教職的李覲。其被選評家推為學記之最，這一現象可以深長思之。春軍此書的研究結果，給我的啟示之大，莫過於此。

由於我跟春軍對宋代學記關注視角的不同，以上所論算不上對其學術成就的公正評議。我從他的書中看到了自己在此領域的耕作並非毫無影響，現在也樂意借這篇書評道出他的研究對我的啟發之處。其實，春軍在復旦攻博期間，直至他的博論答辯會上，我們就此課題已有不少討論。回思往昔，那樣坦誠的討論令人心情愉快，故願再接再厲，持續下去。書中有兩項內容是春軍在博論答辯以後增寫的，一是第二章第三節論黃裳的學記，二是第五章第三節關於《松滋儒學記》的考釋。黃裳是元豐年間的狀元，正是王安石的科舉學校政策所造之士，我近年對此人也有論及，但關心的是他的經義，而不是學記，春軍所論增長了我對黃裳的認識。《松滋儒學記》因署名胡瑗，而被不少教育史論著當做重要史料，其實如春軍所考，肯定是誤署或偽署的。他根據文中提到的人事，推測此文作於宋哲宗元符初年，我以為此文既已出現了“哲宗”廟號，寫作時間就應當更晚，但稱宋神宗為“神考”，則大概不出徽宗之世。文中誇美學校教育對統一的社會文化的塑造，對異議的消滅，完全是《虔州學記》的惡性發展，其所謂“興學”乃是蔡京的學校政策，也就是在失去了蘇軾的批判的時代裏，王安石思路的繼承者一路狂奔的局面。對此文，宜從另一角度來闡釋其重要性。春軍方當盛年，其學精進不已，謹此直呈謬見，權充砥礪。

（作者：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朱剛）